

杜善行在临汝期间的活动情况

□赵俊峰

杜善行同志于1934年至1937年在洛阳师范读书，由于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以及政治腐败，对当时社会逐渐产生不满。洛师毕业后回临汝做教育工作，任留王店小学校长。

1938年2月，由同学陈清源（1954年任南京空军学校教务部长）介绍，杜善行在洛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，中共豫西特委吴芝圃同志派杜善行回临汝开展工作。杜善行回临汝后，先后介绍了王朝栋、于书策、王凤娥（王朝栋之妹）、陈云度（杜的爱人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夏，杜善行和王朝栋两人到洛阳找吴芝圃，要求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临汝指导工作，结果没有见到吴芝圃。后经地下党的关系，他们找到了洛阳教员王××接上关系。王和他们谈话后，仍叫他们先回临汝工作。同年秋，上级党委派何启光同志来临汝领导工作，当时就住

在杜善行家内。何启光到临汝后，成立了中共临汝县委员会，何启光任县委书记，杜善行任统战部副部长，王朝栋任组织部部长。当时杜善行还负责焦村党支部的工作。

当时在临汝工作过的党员有：王正非（镇平人）、曲智化（偃师人）韩显甫（偃师人）、徐步斗（叶县人）、李光兴（临汝县城关人）、朱洪文（安阳人）、沈进宝（临汝县城关人）、于书策（临汝县留王店人）、崔宝珍（临汝县城关人）、张永汉（临汝县庙下长张人）、李海澄（临汝县城关人）、杜吉甫（临汝县小屯李湾人）、郭复礼（临汝县城关塔寺人）、李书田（南召人）、张魁五（郑县人）、王象乾（河北省人）、贺崇升（洛宁人）、何彦云（南阳人）。

1939年春，因工作需要，经何启光批准，杜善行参加了三青团。当时何启光说：“我们党中央与国民党有一个协定，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员，国民党也不吸收共产党员。现在是他们吸收我们参加的。由于工作需要可以参加。”

1939年底至1940年春，因豫西革命环境恶化，组织准备撤退。当时多数同志调往陕北和豫皖苏边区。1940年，何启光走时决定，将杜善行、王朝栋留下，并交

代以后工作可以与鲁山县委书记王子平联系。

1940年春，伪第一战区游击第一纵队，在临汝东乡补充新兵一个团，司令是魏凤楼，系冯玉祥部的一个军长。蒋介石不抗日，他自己组织游击队抗日，思想比较进步。当时，蒋介石对魏凤楼的部队只给有限的经费，不补充人员。杜善行和沈进宝与魏凤楼联系后，即去鲁山请示王子平同志。王子平和杜善行研究后，同意让杜善行去巩县帮助魏凤楼组织新兵工作。和杜善行一同去的有沈进宝、沈际岭。杜善行到巩县魏部后，在新兵团（三团）任上尉副官。3个月，新兵团基本就绪，后国民党又在新兵团设立特别党部，杜善行就决定离开新兵团回临汝。回临汝后见到王朝栋，王朝栋说：“王子平同志走了，临走时叫我告诉你。他说，咱们留下来的人，主要是尽量隐蔽，不开展工作也可以，只要咱们不忘党，党绝对不会忘记咱们的。”

1940年秋，杜善行在家教书，1941年春决意报考河南大学医学院。这个意图在组织撤退时给何启光谈过，认为学医对以后解放事业用处大，何启光当时也同意。1941年2月杜善行考上河大医学

院。1942年春，党中央派干部王庆年来调杜善行、王朝栋两人去陕北，当时杜善行不在家，王庆年只对王朝栋说了，一直到1942年夏，王朝栋才给杜善行讲了此事。

1943年夏，由于叛徒告密，国民党汤恩伯总部向临汝县要人，来函说：“杜善行、杜吉甫、张永汉3人确系共产党员，速速捕归案。”杜善行听到此消息后即休学躲避到长葛县。1943年底，杜善行潜回临汝县暗中找到李海澄，听李海澄说杜吉甫在临汝被捕后，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，要求在临汝县当地处理。临汝县当局答复先给汤恩伯去一封公文，看汤恩伯总部有什么意见。公文去后，始终没有回音，临汝当局也就再也没有追查此事，就这样搁置起来。杜善行又于1944年继续求学至1946年6月1日毕业。后在洛阳天主堂圣心医院当医师，与党脱离联系。新中国成立后要求恢复党籍，但在天主堂圣心医院任职期间找不到证明人，也只好罢了。

（杜善行同志生于1918年12月29日，汝州市城区人。1965年2月24日因患胃癌去世。此材料系从杜善行同志遗留下的笔记中摘抄整理而成）

来源：汝州党史



杨楼镇石台街报恩寺北朝造像碑

□刘孟博 樊亚辉



北朝造像碑

报恩寺位于汝州市区西南五十里许，杨楼镇石台街村东侧，现石台小学、杨楼三中院内，即其故址。报恩寺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，清代时期，地方士绅利用寺内殿宇，创立古二里义塾，远近求学者甚多，为当地培养出了许多人才，汝州明清旧志对此多有记载。清道光《直隶汝州全志·古迹·寺观》卷九记载曰：“报恩寺，在古二里石台镇，元至元年建，乾隆四十二年重修。”清道光《直隶汝州全志·学校》卷五记载曰：“古二里义塾，坐落石台街报恩寺，由来已久。乾隆四十九年，因崔姓造屋侵占学基，经张振宗呈控，罚钱三十五千文，即交振宗生息。道光八年，前守童，追出前项本利钱二千文存库。十九年，里民曹宗海、刘超、李长若，具领置得学田三十亩，以充经费，复经刘让、柴栋、李太等，捐修学舍三楹、厨房一楹，并桌凳等物，现已延师讲课，一乡称便，其地段落四至，详碑记。”

据当地长者杨东山老先生讲述，报恩寺所在地为石台街东寨门内，旧时院内共有各类殿宇三十九间，尚可述及的有山门、大殿、火神殿、广生殿等。上世纪中叶后，废寺兴学，寺内所有殿宇均被改为学舍，大殿门前左右两侧的两块古代造像碑，也被推倒埋入地下。2018年，石台小学进行校舍扩建，施工过程中，无意间将当年所埋造像碑中的一块挖出。村中城隍庙庙主张同青等人闻讯后随即赶往现场，在与村干部及学校领导进行交涉后，自费将其运至城隍庙内妥善保护。

造像碑是以雕刻佛像为主的中国古代石刻艺术，自佛教东传以来，受中国传统刊石立碑的影响，与中原的碑刻传统相结合，于是出现了佛造像碑和造像题记。凿窟造像是佛教造像碑的重要体现，人们在造像上镌刻文字，常铭刻造像缘起、记年，以及造像者姓名、籍贯、官职、发愿文等题记，有时也刻有供养人像，这类石碑在佛教艺术领域称“碑像”或“像碑”。造像碑盛行于北朝时期，多发现于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甘肃等省，宋赵明诚《金石录》记载有光初五年（322年）前赵浮图澄造像碑，是见于著录的年代最早的一例。现存实物，以北魏时期的最早，而以东魏~北齐和西魏~北周时期的数量最多，说明其最盛期在北朝晚期，至隋代日趋衰落，唐代仅偶有发现。其造像题材和造型风格等方面的特征，一般近于同时期的石窟寺艺术，但因雕刻于碑石上面，故多系高浮雕作品，且形体较小，雕琢得更加精细，是研究当时宗教艺术及宗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汝州毗邻洛阳，历史上宗教氛围浓厚，古寺众多，然而遗存于世的古代石雕造像及造像碑屈指可数。石台街报恩寺旧址出土的这块造像碑，由于碑身文字多数已漫漶不清，难以辨识，因此对该造像碑的断代成为难题，通过请教文物专家学者，大家一致认为该造像碑为北朝造像无疑。结合报恩寺建于元代至元年间的历史，推测该造像碑应该原非报恩寺之物，其历史当与北魏之石台县、北周之石台郡时间等同，距今已近一千五百年矣。

报恩寺故址出土的这块北朝造像碑，为扁体碑形造像碑，碑首碑身连为一体，碑座已失。碑首呈弧形，雕六龙盘绕，龙首向下口衔碑身两侧上沿。碑阴、碑额作双龙盘状，与一般碑额相同，但额上居中处刻开有一龛，龛内为一铺三身，雕一佛二弟子像。碑身部分，被等距分为上下两列，每列开有两龛，共四龛，龛内为一铺五身，雕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，佛龛以下则为线雕供养人像。

碑阴、碑额作双龙盘状，与一般碑额相同，但额上居中处刻开有一龛，龛内为一铺三身，雕一佛二弟子像。碑身部分为造像记，由于损毁严重，已无法通读，仅依稀可辨识部分内容，多为布施人姓名。造像碑是源自民间群众力量所建造的佛教供奉物，有独资亦有集资而成，因此造像题记上通常刻有供养人姓名，由民间佛教信徒所组成的信仰团体，称为“邑义团体”，信仰团体的指导僧众称为“邑师”，平民背景的男女信众，则自称佛弟子、清信士、清信女。若属邑义成员，即加冠“邑主”、“邑子”、“邑老”等名衔。供养人是造像艺术的推动者，也是佛法流传的护持者。

汝州文物

汝州北山杏花记

□史运玲

是唧唧喳喳的鸟鸣，将汝州北山沉睡的十万亩野生杏花，从酣然大睡中唤醒。

汝州北部一带诸山，系嵩山余脉，峰峦叠嶂，连绵起伏。杏花，那遍布山野恹恹的杏花，那笑傲春风的杏花，那花开时节漫山似雪的杏花，就是连绵群山上的一抹壮美风景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一方水土也养育一方嘉木。汝州北山水土，似乎很适合杏花生长。大鸿寨、小鸿寨、蜜蜡山、祖师顶、老婆婆、官顶山、大青山、青山山……无数座连绵起伏的群山上，到处是数不清的巨大野生杏树或杏树林。那些杏树高大粗壮，枝叶嶙峋，古貌苍颜，风骨凛然。难怪《汝州市志》上记载，东汉时期，“中原嵩高山（即嵩山）南野杏极多，丧乱之年，百姓皆资以以为命，人人皆饱。”汝州这些山，恰恰位于嵩山之南，至今，陵头镇北部仍有“杏子岭”，大峪镇山杏也特别丰富。

所有这一切，和历史记载非常相符，它证明了汝州北山一带的杏树，在东汉时期已经相当有名气了。沧海桑田，时光变迁，走过秦汉明月，走过唐风宋雨，岁月的更迭嬗变中，让老汝州子引引以为豪的许多历史风物，早消失在时光的云烟深深处，杳不可寻。汝州北山那数不清的巍峨山峰，却依然横亘在广袤的大地上，千百年来无私地润泽着民众，为老百姓避风避雨，为他们贡献种类繁多的漫山遍野中药。尤其春天一到，从东往西，焦村、大峪、骑岭、陵头，甚至庙下和临汝镇的连绵群山，都成了杏花的汪洋大海。大片大片的杏花，葱葱郁郁，像团团从丛的雪，将远山近村，笼罩进了水墨风景的世界。

漫长的冬天来临，脱去了绿装的杏树，就陷入了沉

沉的昏睡之中。雪来了，洁白的飞雪来了。它轻盈地飞着，若有若无地回旋着。这轻盈的春的使者本以为，它会令杏树睁开睡眼望她一眼，却没有料到，人家根本不屑于她的多情，瞥也不瞥她一眼，反而睡得更加舒坦了。树根边那厚厚的积雪，好像为它屏蔽了外界的一切喧嚣，杏树的睡梦，更加沉，更加香甜了。

是耳边唧唧的鸟鸣，吵醒了沉睡的杏树。杏树抹一把睡眼惺忪的眼，它有几份惊讶了；身旁的杨柳，何时披上了绿装？苍茫的大地上，又何时氤氲起了清新的绿蒙蒙烟雾？那数不清的小草也发芽了，给灰蒙蒙光、凸凸的山野，披上了若有若无的亮。那些野生的连翘啊、桃树啊、梨树啊，也似乎在枝条上鼓起了劲爆的花蕾，只等待春风一唤，就亮起一树的缤纷。

你看，你看，苍茫的群峰上，千树、万树的杏花，不管不顾地热烈着怒放，将一树一树的白，层层叠叠铺陈在苍茫天宇。给一座座山峰，增添无尽的灵气与秀雅。它们，肆无忌惮地张扬着自己的美丽，生动着山区的眉眼，将山区的春天妆扮得妖娆多姿，更将无数旅人的脚步，勾引而来。

杏花怒放时节，如果想观赏杏花，可以从汝州至大峪的西线公路进入大峪林区，再从盘旋在群山之巅的新马线绕行焦村镇回归汝州。这是人在画中行的一段美丽行程。

车过汝州陵头镇养田村，便开始进入了山区。数不清的山峰，波浪似地涌来，盘山公路绕山逶迤，车行其间，就像一尾鱼儿，在波浪间起伏。那些神态迥异，神姿仙态的美丽杏花，就在身畔的山山峰峰间，环肥燕瘦各呈妖娆。树龄长的，古貌苍颜，花型壮美，满树繁花；树龄短的，树

身硕长，花冠扶疏，青春气息逼人。尤其那些野生杏花，没有人为地修剪，浑身上下洋溢着自由自在的野性狂放之美，时不时惊艳了旅人的眼眸。鲁山作者南巧琴笔下描绘的“稀疏的杏树是苍茫的寂寥，加上雾霏，只看见三五成群大朵的茫然”之意境，也时不时映入眼帘。

大峪大平村以及邢窑村，是新马线上比较有名气的杏花观赏点，徜徉其中，心旷神怡。春风吹过，纷纷扬扬的杏花雨飘落，满地琼瑶，一身洁白，醉人的香气直入肺腑。伫立山顶，遥望那些掩映在“白雪”中的水墨村庄，我久久不忍离去。做一个大峪人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，能生活在这样秀雅绝伦的宜居之地，呼吸这不可多得的新鲜空气，能延年益寿多少年呢？

此景人间几回睹？分明偶然画中游！这恬静优雅的环境，让我忘却了红尘的琐碎碎碎，我只想在这静静的世界里，与杏花对望，与流云絮语。赏杏花之静美，感大峪古镇之风华，仰望宇宙之大，叹吾辈之渺小。

享受这旷古的静谧和心灵的恬淡、恬静之时，我的心也在神驰天外，意游八荒，发遐思，诵诗词，万缕情思心中飘……山上的杏花分明是有傲骨的，与我心有戚戚焉！它虽然寄身山涧谷底，却不以贫贱而自叹，不以寂静而失落，一到开花时节，依然芳菲天涯。山，灵秀了大峪；这千树万树杏花开，又增添了山峰的风韵。难怪杏花盛开之际，游人如织，或全家出动，或友人相伴，花间流连，花下品茗，其乐融融，不可语述。

美丽的汝州杏花，我愿你永远笑傲春风，能让在我的怀抱里感受活着的幸福与美好！我更祝愿你在打造汝州全域旅游的怡人东风里，展翅翩跹，飞向更加美好的未来，把杏花之美推向极致！

老行当之裁缝铺

李晓伟

手艺人最让人着迷的地方，或许就在于他们总能够让人在喧嚣的时代当中，感受到一种岁月的静好与从容。

比如从前常见的裁缝铺，不管铺子里有人没人，裁缝们总是端坐在缝纫机前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只管一门心思地脚踩着踏板，听着“咕哒咕哒”的声音，按照客人心中勾勒出的模样，精心为他们做一套满意的服装。

旧时缝制服装，大多是个体自将量体、裁剪、缝纫、熨烫、试样等各项工序，一人完成。对这些以缝制衣服为职业的人，人们称之为“裁缝”。由于缝制服装的品种不同，裁缝又被区分为中式裁缝、西式裁缝、本帮裁缝等等。但在中原小城，没有那么多分类。且不管如何区分，“量体裁衣”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“量体裁衣”，是若干年前为了新年穿新衣的仪式感。

以前的生活条件比较差，很多人的衣服都是“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特别是兄弟姐妹较多的人家，基本上是“老大的衣服老二穿，老二的衣服老三穿”，依次类推，按汝州话叫“溜二茬”。

那时的人平时舍不得做新衣服，因此，过年时大人小孩都要去裁缝铺做一套新衣服，尽情“奢侈”一把，享受这一年来辛勤劳动的果实。因此每到年关，裁缝铺的重要性就会得到充分体现，出入的门槛都快要被“踢折”了。

彼时，老城区中大街隔三岔五就会有一个裁缝铺，谁家谁家的衣服样式比较新，谁家谁家的衣服脚印比较细，那都是口口相传，有口皆碑的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们对于温饱的追求，远远大于精神的满足。于是，那个年代，裁缝铺的存在，仅仅是为了满足过年时候缝制一件新衣服，或者是平日里缝缝补补的需要。对于款式或者品牌，人们都没有过多的要求。

小城的裁缝铺，高光时刻是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。那时的市中心青年广场上，一座个体户云集的工业品市场刚刚建成使用，尽管成衣店鳞次栉比，但卖布匹的也不在少数。于是，老城区的裁缝铺都到此驻扎，一个挨一个地固守在市场西墙外不宽的过道里。当然，有门店经营，也有露天摆摊的。

在过去，可供选择的布料比较单一，无非就是卡其、涤卡、涤纶、的确良、灯芯绒等，但色彩较之前明显多了起来。倘若哪里来了一批好的布料，人们便相互传开，大人赶紧争相抢购，生怕去晚了，那些色彩艳丽的布料被人抢购一空。

不大的裁缝铺内，设备基本相同，缝纫机是必须有的重要设备，还有剪刀、尺子、针盒、线板、熨斗、粉饼等。裁缝们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重量尺寸：肩宽、袖长、领围、衣长、腰围、臀围等，将数据记在纸上。然后，嚓嚓嚓，布料上呈现出一道道划线；咔咔咔，布料被一块块裁开，然后再开始重新缝合。几天后，一件崭新的衣服就可穿在顾客身上了。

缝衣服，踩缝纫机是关键，也是非常讲究技巧的，用力必须平衡。如果用力过猛，踏板会翻转；倘若力气不到，踏板则带不动机头运转。不仅如此，缝制衣服的时候，手和脚必须讲究配合。因为每缝制完成一段布料，手必须往前拖动布料，此时速度太快或者太慢，都会造成针脚不均匀等问题。其间，精神还必须高度集中，如果稍有不慎，不仅有可能出活的不好，甚至手指还会受伤。

从布料变成衣服，要经过量身、裁剪、熨烫等近十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。那时的裁缝师傅干的“良心活”，很会为东家精打细算，布料不浪费，一些边角料也会充分利用起来，做个口袋内衬或者拼接起来做成衣服什么的，尽量做到物尽其用，不糟蹋布料。就是多下来的边角料，裁缝也会收拾起来，用糨糊裱糊起来，用来做鞋垫。

在裁缝行业最鼎盛时期，掌握了这么个手艺，就意味着能够吃上一口轻松饭，光靠这手和眼上的功夫，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有的裁缝能凭着精湛的手艺办起学习班，能吸纳不少学徒。“裁缝”一词如何诞生，如今已无法考证。在《周礼·天官·缝人》中，已有“裁缝”一词出现，“女工，女奴晓裁缝者。”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《代陈思王》中，也有记载：“侨装多阙袪，旅服少裁缝。”《水浒传》第二回中，同样也有着相关记载：“次日，叫庄客寻个裁缝，自去县里买了三四红锦，裁成三领锦袄子。”

在古代，裁缝被称为“缝人”“缝子”“缝工”“成衣人”等，轩辕、嫫母、黄帝、有巢氏、钟神等，被尊崇为这个行业的祖师爷。据清朝顾张思《土风录》载：“成衣人曰裁缝，盖本为裁翦缝缀之事，后遂以名其人”。裁缝是一个古老的职业，从远古先民的生活传承至今，已经走过了数千年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蝴蝶牌缝纫机、红灯牌收音机、永久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，是青年男女

结婚的“三大件”。拥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，几乎是那个时代里每个待嫁女子的梦想。每个裁缝铺都必须有缝纫机，不管是借钱买的，还是自己积蓄买的，也算是殷实人家了。

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，不用的时候机头部分能够折叠到缝纫机的机身里面。这样一来，家里就像是多了一张桌子，需要的时候，把机头弄出来就可以工作；不需要的时候折叠进去，就可以在上面吃饭、写作业了。

如今，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。成衣制造业的崛起带来了更为便捷的购物体验，但也伴随着对传统裁缝文化的淡忘。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，物质开始变得丰富，人们越来越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，让成衣企业如同雨后春笋，争相抢占市场份额，裁缝这一行业慢慢退出人们的生活圈。即便街头有几家缝纫店，也由原来的做衣服变成改衣服，且生意也大不如从前红火。

现如今，人们在穿着上已起了很大变化，颜色、样式、质料更为鲜艳多彩，并向“高大上”发展，但喜欢穿新衣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

布如手中墨，衣是无声诗。不管是裁缝铺也好，裁缝也罢，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，也是几代人的记忆。穿针引线、量体裁衣，这个老行当看似呆板，里面却蕴含着传统的东西，那就是必须要有的那颗匠心。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“老手艺”，温暖了季节，惊艳了时光。